

## 第一编

## 佛法东来

## ——两汉、三国、西晋佛教

佛教产生于印度，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长期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佛教逐渐与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相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汉、三国、西晋时期，是佛教初传中国内地并在中国社会扎根发展的重要时期。

佛教初传中土的确切时间，难以考定，目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说。到后汉末期桓、灵二帝时代，由于西域佛教学者相继来到中国，如安世高、支娄迦谶等，由此译事渐盛，法事渐兴。此时的佛教首先是在宫廷中流行，并且被看做祠祀的一种，混同于黄老之学。三国时期，戒律传入中国，开中土依戒律受戒之先河；朱士行西行求法，是中国沙门西行求法之第一人。在佛经翻译方面，

有康僧会译介的小乘禅学和支谦译介的大乘般若学。到西晋时，佛教有了相当的发展 翻译佛经 弘传教义 建寺度僧 信仰佛教者逐渐增多，其中，竺法护等翻译并弘扬的般若性空学，是这一时期主要的义学思潮。

# 第一章

## DONG HAN FO JIAO

### 东 汉 佛 教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 6—5 世纪的古印度，开始主要流行于恒河中上游一带。至公元前 3 世纪阿育王时，佛教开始向印度各地以及周围国家传播，逐渐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并在许多国家形成各具特色的教派。佛教在传入中国内地之前，已在西域地区广泛流传。自汉武帝时代开辟对西域的交通以后，西域各国与中国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十分频繁，从而为印度佛教的传入准备了条件。

#### 第一节 佛教的初传

##### 一、佛教传入前后的中国社会

佛教传入前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为佛教的传入和流行提供了一定的土壤。

首先是当时社会现实的黑暗。东汉时期是佛

教输入中国内地并在中国社会开始流行的初始阶段。西汉末年，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和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各种社会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导致了农民起义的爆发。靠篡夺农民起义成果而当上皇帝的刘秀所建立的东汉王朝，代表的是豪强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东汉后期，政治越来越腐败。自汉和帝（69—105年）以后，外戚、宦官交替专权。他们利用职权对人民巧取豪夺，横征暴敛，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和痛苦。与此同时，各种自然灾害接踵而至，它们与沉重的赋役和租税迫使农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终于官逼民反，于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爆发了黄巾大起义。起义最后被残酷地镇压下去，成千上万的农民惨死在地主武装的屠刀之下，但东汉王朝从此名存实亡，中原地带陷入了群雄割据、连年混战的局面，广大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这种社会现实有利于宣扬人生无常、众生皆苦的佛教的流行。

其次是思想文化的变化对佛教传播的影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在思想文化界占据统治地位，儒家经学通过宣传天人感应的神学和纲常名教思想来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然而，这种日趋繁琐粗俗的理论到东汉后期逐渐失却了维系统治的作用，正统地位发生了动摇。因此，东汉末年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一度出现了比较活跃的情况，先秦诸子学说纷纷再兴，其中名法和道家思想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玄学处于酝酿之中。这种思想文化状况显然为佛教思想的传播和发展留下了空隙。

两汉时期社会上盛行的各种方术迷信与东汉时产生的道教等，也都为佛教的流行创造了条件。西汉时，天帝、鬼神、祖先的崇拜和祭祀、卜筮、占星、望气、风角<sup>①</sup>等种种方术，在社会上都很有流

<sup>①</sup> 风角是依据风的方向、强弱、状态和声音来进行占验吉凶的一种方术。《史记·天官书》说汉代著名的占岁者是魏鲜，他每年正月初一从风向、风力来占验一年气候和农事的丰歉情况。

行，特别是求长生不死的神仙方术更为盛行。不少方术之士还入朝为官，从县令、太守而至司徒、司空，可谓显赫一时。这必然促使方术之风更加盛行。到东汉顺帝时，以黄老学说为基础，吸收传统的鬼神观念和迷信方术，正式形成道教。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早期教义学说比较简单，仪规戒条也不很完备。佛教作为比较成熟的宗教传入中国，对道教的进一步完善、发展无疑会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道教最初往往将佛教引为同道，而佛教在初传之时也往往被曲解为道术的一种。这种局面，为佛教的流传与发展创造了一种适宜的文化氛围。

再次是中西方交通的开拓。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路线有海、陆二路。海路的开辟比陆路晚些，因而直到南北朝时才有译经大师经海路来到中国的记载。海路是指经由斯里兰卡、爪哇、马来半岛、越南而至广州，再进一步传至内地。

陆路即由西域各地经著名的“丝绸之路”而传入。汉时所谓的“西域”，一般是指玉门关（现甘肃敦煌县西）、阳关（现甘肃敦煌县西南）以西，葱岭、帕米尔以东，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的广大地区。这一带地方有三十六国，后来分裂为五十多个小国。随着中西交通的发展，人们往往把通过以上地区与汉地有着交通往来的中亚、西亚甚至南亚次大陆一些国家也称为西域。西域长期处于匈奴的控制之下，到汉武帝时，西汉的国力达到了鼎盛。建元三年（公元前 138 年）出于抗击匈奴的需要，汉武帝派张骞等人首次出使西域，客观上开辟了中西方的交通，沟通了中西方的联系。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 年），汉武帝为联合乌孙（现新疆天山以北地区）抗击匈奴，派张骞率三百人出使乌孙。张骞在乌孙又派副使多人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在阿姆河以南，今阿富汗一带地方）、安息（今伊朗）、身毒（印度）、罽国，沟通汉与这些国家的正式往来。

汉与西域各国的交通路线分为南北两道。南道是指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沿昆仑山北麓，经于阗而至莎车。北道是指从敦煌

北上到伊吾(今新疆哈密)然后西行沿天山南麓经龟兹而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市)。以上两道都在天山南侧,因而又统称天山南路。东汉时著名的译经大师安世高和支娄迦谶就是经天山南路来到中国内地传播佛教的。此外,还有一条天山北路,即从哈密出发沿天山北麓而行,中经乌孙、大宛,至康居。这条道路不如以上两条道路重要。这几条沟通中西联系的道路,就是闻名世界历史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开辟为佛教东传扫平了道路。

印度佛教就是在上述社会背景下经西域传至中国内地并广泛流传发展的。

## 二、佛教初传中国内地的时间

关于佛教初传中国内地的确切时间,历史上很难考定。长期以来有以下不同的说法:一是认为在西汉哀帝以前,佛教就已传入内地。如“三代以前已知佛教”;“周代已传入佛教”;“孔子已知佛教”;“战国末年传入佛教”;“中国在先秦曾有阿育王寺”;“秦始皇时有外国僧众来华”;“汉武帝时已知佛教”;“刘向发现佛经”等种种说法。

二是认为在西汉哀帝时,佛教从西域传入内地。西汉末年西域与我国内地,以及西域人与汉族人都有所往来,西域派来的外交使节和商人中,还有一些佛教信徒。三国时魏国鱼豢《魏略·西戎传》<sup>①</sup>记载:“或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魏书·释老志》作‘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

大月氏于公元前130年左右迁入大夏地区,其时大夏已有佛教流传。至公元前1世纪末,大月氏受大夏佛教文化影响,接受了佛教信仰,从而辗转传进中国内地,是完全可能的。

三是汉明帝永平年间传入说。根据多种典籍的记载,东汉永

<sup>①</sup> 《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商务印书馆缩印百衲本》第481页下。

平年间(58—75年)汉明帝于夜晚梦见一位神人,全身金色,顶有日光,右手握着两把箭,左手拿着弯弓,在殿前飞绕而行。第二天,明帝会集群臣问:“这是什么神?”当时学识渊博的大臣傅毅回答道:“听说西方有号称‘佛’的得道者,能飞行于虚空,神通广大,陛下所梦一定是佛。于是,明帝派遣蔡愔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三年后,蔡愔等人从西域请来了僧人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人,并得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还洛阳。汉明帝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专门为之建立佛寺,命名‘白马寺’。白马寺便成为我国汉地最早的佛寺。这是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又一种说法。这一说法在古代佛教徒中流传最为广泛。”

总之,汉明帝求佛说法,从其基本情节来说是比较可信的,但它只是说明印度佛教继西汉哀帝之后继续向中国内地传播,而不能说这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佛教初传中国,应是在西汉末年的哀帝时期。目前,这一说法也为佛教界所公认。1998年佛教界举办了庆祝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的纪念活动,正说明了这点。

## 第二节 汉译佛典的产生

佛教是外来宗教,它在中国的传播,是与佛经的译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东汉末年以前仅有《浮屠经》的口授和译者不明的《四十二章经》的流传,此外有无经典,已不可考。但到东汉末年桓帝、灵帝时,不少古印度和西域僧人来到汉地,以洛阳为中心,译出大量佛教典籍。据现存最早的经录《出三藏记集》记载,从汉桓帝到献帝的40余年中,共译出佛典54部,74卷,知名的译者6人;唐代《开元释教录》勘定为192部,395卷,译者12人。初期的佛经翻译内容,可分为两个系统:一是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小乘禅数学,一是以支娄迦讖为代表的大乘般若学。人们一般以《四十二章

经》为中土佛教最初的译籍，又以《牟子理惑论》为中土佛教最初的论著。

### 一、《四十二章经》和《牟子理惑论》

《四十二章经》是现存最早的汉文佛经。相传为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抵洛阳后译出。汉明帝下令将它收藏于朝廷专藏图书的兰台石室，并为两人修建白马寺以居。这是佛教史上的一般看法。但近代有学者认为，《四十二章经》并非真正译本而是汉人自己的撰述。如梁启超先生说，这部经不是依据梵文原本比照翻译，而是人们在多种经内选择精要依照《孝经》、《老子》等书编撰而成。<sup>①</sup> 汤用彤先生则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四十二章经》既不是一部独立的经典，但也不是汉人的撰述，它是从小乘佛教经典中辑录佛教基本教义的“外国经抄”。因它由 42 段短小经文组成，故名。<sup>②</sup> 吕秋逸先生在对《四十二章经》与三国时代译出的《法句经》比较研究基础上得出另一结论：《四十二章经》抄自《法句经》其抄出年代当在 306—342 年间。<sup>③</sup>

《四十二章经》主要阐述了人生无常、众生皆苦的佛教原理，劝告世人放弃爱欲，积极修行，以求解脱。如说：“惟人自生至老，自老至病，自病至死，其苦无量。心恼积罪，生死不息，其苦难说。”<sup>④</sup> “佛问诸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在数日间。佛言：子未能为道。复问一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在饭食间。佛言：子未能为道。复问一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呼吸之间。佛言：善哉，子可谓为道者矣。”<sup>⑤</sup> 又说：“爱欲之于人，犹执炬火逆风而行，愚者不释炬，

① 见《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中卷。

②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 24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③ 吕秋逸：《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 21、22 页，中华书局，1979 年版。

④ 《大正藏》卷 17 第 723 页下。

⑤ 《大正藏》卷 17，第 724 页上。

必有烧手之患”；<sup>①</sup> “人为道去情欲，当如草见火，火来已却。道人见爱欲 必当远之”。<sup>②</sup>

该经文字简短，但包含了佛教修道的基本纲领。文字叙述生动形象，常以比喻阐明佛理。如经中说，人之贪色爱财，好比小孩以舌舔刀刃上的蜜，后果不堪设想。又比如说，恶人陷害好人，好比仰天吐唾沫，天不会被他的唾沫所染污，而唾沫掉下来正好玷污了自己。

《四十二章经》的特点，使它成为一部适应佛教初学者所需的入门书，在佛教初期流传中起了重要作用。

《牟子理惑论》一书 通称《牟子》 又称《理惑论》。相传为东汉末年牟子所著，最早见录于刘宋陆澄的《法轮·缘序》中，并注曰：“一云苍梧太守牟子博传”。但在《隋书·经籍志》中则注称“汉太尉牟融撰”。后来的新旧《唐书》因袭此说 致使人们将著《理惑论》的牟子与汉章帝时的太尉牟融相混淆，由此而引起对该书真伪问题的长期争论。

近代以来，国内外学者曾对《牟子理惑论》展开过热烈讨论。梁启超、吕秋逸等学者认为，该书系晋宋间人所撰。而胡适、周叔迦、汤用彤等学者则确定该书是汉魏时的作品。

目前 有关《牟子理惑论》的作者姓名及其生平事迹等 还不很清楚。但从现存《牟子理惑论》一书的内容来看，当是汉魏之际所撰成。尤其从“序传”一节来看 所述之事多可与史实相印证 并可补史料之所阙。该书作者原是儒生，博览经传。他也曾熟读神仙家之书，但认为那些书大多虚妄不可信。后因见天下大乱，乃避乱到了交趾。他因信奉佛教受到当时人的非议，故作《理惑论》以自辩。

① 《大正藏》卷 17, 第 723 页中。

② 《大正藏》卷 17, 第 723 页中。

《牟子理惑论》共 39 章 若不计首尾“序传”和“跋”则正文为 37 章。据称这是因见到“佛经之要有 37 品 老氏《道经》亦 37 篇”故作 37 条问答。全书以自设宾主的问答方式阐发佛教基本的教义。内容包括释迦牟尼出家、成道、传法等事迹；佛经的卷数以及戒律的规定；佛教对于生死的看法；佛教在中国的初传情况等。在书中作者大量引用儒、道和诸子百家之言，以图说明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一致，表现出明显的儒、佛、道三家一致的倾向。比如他对“佛”的解释 是以道家观点展开的 说：“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佛之言觉也 恍惚变化 分身散体 或存或亡 能小能大 能圆能方 能老能少 能隐能彰 蹈火不烧 履刃不伤 在污不辱 在祸无殃 欲行则飞 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sup>①</sup> 又比如他对佛教的解释 除了加以道家化 还加以儒家化 说：“天道法四时 人道法五常。”所谓“五常”则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并认为通过对佛法的修习“居家可以事亲 宰国可以治民 独立可以治身”。这显然是以儒家思想来解释佛教教义。

《牟子理惑论》从传统文化角度去理解佛教，反映了佛教在中国初传时期的实际状况。

## 二、安世高所传的小乘禅学

安世高 名清 原为安息国太子 自幼勤奋好学 通晓天文、风角、医学等方术，在西域诸国颇有名声。平时信奉佛教，经常讲经说法。其父王死后，他将王位让给叔父，出家修道。后游历各国传教，在汉桓帝建和二年（148 年）到达洛阳 很快学会汉语 到灵帝建宁年间（168—172 年）20 余年 共译佛典 34 部 40 卷。所译佛经主要有《阴持入经》、《安般守意经》、《道地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百六十品经》和《人本欲生经》等。灵帝末年 中原战

<sup>①</sup> 《弘明集》卷一。《大正藏》卷 52，第 2 页上。

乱 安世高避乱到江南 经庐山、南昌至广州 后死于会稽（今浙江绍兴）。

安世高的译经“义理明析 文字允正 辩而不华 质而不野”，很受后人好评 被誉为当时的“群译之首”。吕秋逸先生认为，“安世高的汉译佛典，可算是种创作，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有它的特色。就内容说，他很纯粹地译述出他所专精的一切。……至于译文形式，因为安世高通晓华语，能将原本意义比较正确地传达出来。”<sup>②</sup> 吕秋逸先生又指出，安世高的译经从总体上来说毕竟偏于直译 有些地方顺从原本结构 不免重复、颠倒 而术语的创作也有些意义不够清楚的地方。

安世高翻译介绍了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的理论。说一切有部是从上座部中分化出来的，主要流行于古印度西北的克什米尔、犍陀罗一带。关于安世高的译经，道安说：“其所敷宣，专务禅观”<sup>③</sup>；又说：“博闻稽古，特专阿毗昙学，其所出经，禅数最悉”<sup>④</sup>，“安世高善开禅数”<sup>⑤</sup> 这些都说明安世高所精的是禅经与阿毗昙学 所传的为“禅数”之学。

所谓“禅数”的“禅”指禅观 即通过禅定静虑 领悟佛教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以期达到神秘的涅槃境界。“数”即数法，指阿毗昙。阿毗昙 也译为阿毗达磨、毗昙 因以数把教法分类 如四谛、五蕴、八正道、十二因缘、十八界等 故也可译为数法 此外还常译作“论”是对经《阿含经》或教法的论释。由于阿毗昙能使人懂得佛教的道理 故也称阿毗昙为“慧”。因此，“禅数”也就是后来中国佛教常说的“定慧”、“止观”。

① 《出三藏记集》卷十三之《安世高传》。《大正藏》卷 55,第 95 页上。

② 吕秋逸：《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 285 页 中华书局，1979 年版。

③ 《出三藏记集》卷六之《阴持入经序》。《大正藏》卷 55,第 44 页下。

④ 《出三藏记集》卷六之《安般注序》。《大正藏》卷 55,第 43 页下。

⑤ 《出三藏记集》卷六之《十二门经序》。《大正藏》卷 55,第 46 页上。

代表安世高一系禅学思想的主要是《安般守意经》和《阴持入经》。这两部经典在三国时都已有了注释。它们的内容都是提倡通过戒定慧来对治各种“惑业”，通过禅定修习而获得解脱。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安般守意经》侧重于“禅”学其所传禅法影响最大的是“安般守意”（“安般”是梵音安那波那之略指呼吸）后称“数息观”。“数息观”要求用自一至十反复数念气息出入的方法，守持意念，专心一境，从而达到禅定境界。并且认为这种禅法最后可导致“存亡自由”、“制天地 住寿命”的境地。这种修行方法颇似中国古代神仙方术家的呼吸吐纳、食气守一等养生之术。

《阴持入经》侧重于“数”学。“阴持入”新译作蕴、处、界。亦称佛教“三科”。它偏重于对名相概念的分析与推演，其理论是通过四谛、五蕴、十二因缘、三十七道品等佛教基本概念的分析来表达的。

安世高小乘禅数之学中所强调的“止观双俱行”重视“持戒”等，都对后世的禅学乃至整个中国佛教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当时临淮（安徽宿迁西北）人严佛调是汉地第一个出家者。他撰写了第一部汉僧佛教著作《沙弥十慧章句》开始发挥安世高学说。三国吴康僧会曾从安世高弟子韩林、皮业、陈慧随学，并与陈慧共注《安般守意经》。晋僧道安为大小《十二门经》、《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人本欲生经》等经作序作注。东晋名士谢敷也曾为《安般》作序。东晋时期著名的佛学家释慧远和竺道生等也都深受其影响。

在洛阳另一个译经的安息人是安玄。他是个在家持戒的居士。汉灵帝末年到洛阳经商，常与沙门讲论佛法，世称为“都尉玄”。他同严佛调一道翻译了大乘佛经《法镜经》一卷。此经与《大宝积经·郁伽长者会》属同本异译，是阐明在家修菩萨的大乘经典。安玄比安世高晚来洛阳 40 年，已开始翻译大乘佛经，说明大乘佛教此时已在安息流传。

### 三、支娄迦讖所传的大乘般若学

在和安世高同时期来到洛阳的佛经翻译家中最有名的是支娄迦讖。据《出三藏记集》卷三十《支讖传》记载，他本是月氏国人，简称支讖。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来到洛阳，至灵帝中平（184—189年）年为止，译出佛经十四部二十七卷（或作十五部三十卷）。主要有《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般舟三昧经》和《阿閼佛国经》等，全系大乘佛教经典，其中以《道行般若经》最为重要。

《道行般若经》亦称《般若道行品》，与三国吴支谦译《大明度无极经》、姚秦鸠摩罗什译《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属同本异译，宣扬“诸法一切事物和现象悉空”、“诸法如幻”的大乘佛教般若学理论。此经是大乘般若学介绍进中国内地之始。大乘般若学在魏晋时曾依附玄学而盛极一时，并对整个中国佛教的理论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都是讲大乘禅法的。“首楞严”意译“健相”、“勇伏”等；“三昧”即是禅定的另一种梵音。所谓“般舟”意为“佛现前”、“佛立”。修此“三昧”可使“十方诸佛”在虚幻想象中出现于行者面前。《般舟三昧经》还将阿弥陀佛介绍到中国，给中国佛教以很大影响。净土经典《无量清淨平等觉经》也被疑为支娄迦讖所译。

此外有《阿閼世王经》二卷、《宝积经》一卷、《兜沙经》一卷、《阿閼佛国经》一卷等十部经，道安认为“似支讖出”。

支讖经常和天竺沙门竺佛朔合作译经。经常是竺佛朔宣读梵文，支讖译为汉语，汉人孟元士笔录成文。有时是汉人孟元士、张莲笔录成文。东汉末年外国僧人来华译经还得到了汉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早期信徒的支持，如孙和、周提立等“劝助者”就是提供译经资金、场所和各种生活用品的施主。可见，民间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对译经事业的赞助，是译经事业顺利开展的重要条件。

在汉灵帝、献帝之间于洛阳从事译经的还有支曜、康巨、康孟详等人。支曜疑为大月氏人所译《成具光明经》一卷与支谶所译《光明三昧经》是同本异译，也是大乘禅经。康巨，当是康居人，译《问地狱事经》一卷已佚。康孟详，也许是康居人与罽宾合译了《中本起经》。

综上所述，东汉末年的译经者主要是外来僧，他们或是单译，或是合译，虽有汉地僧人或居士参加，但只是从事辅助工作。他们所译经典，包括了大、小乘佛经。这一时期以译经为主，著述和注释极为少见。

### 第三节 东汉佛教发展的基本概况

#### 一、流传区域

汉代佛教在中国流布的区域还不普遍，其重心大略有三处：

（一）洛阳。因为洛阳是东汉的首都，是西域人聚集之所。安世高和支谶等人是从安息国和大月氏国来中国的。由西域来中国，凉州（即今甘肃张家川一带）和长安是必经之地。但因为缺乏文献资料可考，当时凉州和长安的佛教情况不明，洛阳乃成为我们所知的东汉唯一译经场所。安世高和支谶均在洛阳活动，严佛调也在洛阳出家。

（二）江淮之间。西域交通开辟后，洛阳最先成为佛教中心。东汉末年爆发了黄巾农民大起义，不少佛教徒因逃避战乱，从洛阳、关中汇集到丹阳（今安徽宣城）、彭城（江苏徐州）、广陵（江苏扬州市）等地，即江淮流域。江淮流域古代盛行黄老之学，相信方术和仙道的人很多，这种情况有利于佛教在该地区的流传。东汉初楚王刘英受封的楚国就在此处，其领地以彭城为中心，涉及淮河南

北。据《出三藏记集》卷五载慧叡《喻疑》说：“汉末魏初 广陵 彭城 二相出家 广陵相是赵昱 彭城相是薛礼）并能任持大照 寻味之贤 始有讲次。”<sup>①</sup>就是说，他们都信奉佛教，并且招有学问的佛僧宣讲佛经。再者，从丹阳人笮融在彭城和广陵之间建造浮屠寺等事看来，当时徐州、扬州等地佛教已很流行了。

（三）交趾。交趾是中国与印度水陆交通的枢纽，也是中国早期佛教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东汉建安八年（203年）改称交州。交州刺史统辖七郡 即南海郡（今广东东部）治在番禺（今广州）苍梧郡（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治在广信（今梧州）郁林郡（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中、西部）治在布山（今桂平西）合浦郡（今广东广西南部，包括海南岛）治在合浦（今广西合浦东北）交趾郡（今越南北部）治在龙编（今河内东北）九真郡（今越南中北部）治在胥浦（今清化）日南郡（今越南中南部）治在西卷（今广治）汉末士燮（137—226年）任交趾太守（同时领有广州）任职 40余年 社会相对稳定，一些中原士人避难在此。《三国志·吴志·士燮传》载：“燮体器宽厚 谦虚下士 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sup>②</sup>佛教和道教方面的“异人”也集中了不少。据说牟子避乱至交趾，在此著《理惑论》。三国时吴国名僧康僧会即在交趾出家为僧，后入建业传教。此外，三国时在交趾译经的还有西域僧人支疆梁、耆域等人 南朝齐梁之际 有释慧胜、道禅等人在交趾传播佛教。

近年来，从考古发掘看，东汉年间四川地区也有佛教的流传。在四川乐山县麻浩享堂梁上刻有一个端坐佛像，高 37 公分 宽 30 公分 面部已残 绕头有佛光 身上好像披着通肩袈裟 右手上举，伸五指 掌心向外 似作“施无畏相”左手似有所执。在其附近与其风格相同的有纪年铭的崖墓里，有顺帝“永和”（136—141年）

① 《大正藏》卷55，第41页中。

② 商务印书馆（缩印百衲本）第575页下。

和桓帝‘延熹’(158-167年)等年号。<sup>①</sup>可见,乐山崖墓所雕佛像应是东汉末年的作品。

同时,在四川彭山崖墓内,发掘出一个陶制佛座,高20.4公分。上塑有一个端坐佛像,左右各立一侍者。墓内虽无纪年文字,但与陶制佛座同时出土的陶俑、陶动物以及陶制屋宇等等,都具有明显的东汉器物特征。<sup>②</sup>

关于四川的佛教,在东晋之前缺乏文献记载。四川佛像的发现,给佛教史学界提出了一个问题:四川佛教是从什么途径输入的呢?史书不能给我们满意的答复,但从这些考古发现中,至少可以证明在三国以前,四川已传入佛教。

## 二、建寺、造像及佛教信仰

### (一) 中国第一古刹——洛阳白马寺

白马寺初创于东汉永平十一年(68年)距今已有1930余年的历史。《历代三宝记》、《洛阳伽蓝记》等书记载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年)摄摩腾和竺法兰将《四十二章经》和画像用白马驮着回到洛阳,汉明帝礼请二位高僧暂时下榻于鸿胪寺(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翌年,又敕命于洛阳城西雍门外修建僧院,这就是著名的白马寺。为什么叫白马寺呢?据载,一是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二是因二位高僧下榻于鸿胪寺,遂取其“寺”字。

但是最早记述东汉明帝感梦求法的《牟子理惑论》、《四十二章经·序》等以及正史资料均不见白马寺这个名称。那么,到底汉明帝时有没有修建白马寺,从现在考察,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为安置西域僧侣居住而兴建一些佛寺是可能的;当然,开始不一定叫白马寺。《高僧传·摄摩腾传》记载:“愷蔡愷,筹于彼天竺,遇见摩

闻宥《四川汉代画像选集》(群众出版社,1955年版)第59图。

<sup>②</sup> 间引自《沂南画像石墓发掘报告》第6章及插图42。

腾乃粟邀还汉地……明帝甚加赏接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有记云：腾译《四十二章经》一卷，初城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腾所住处，今洛阳城西雍门外白马寺是也。相传云：外国国王尝毁破诸寺，唯招提寺未及毁坏，夜有一白马绕塔悲鸣，即以启王，王即停坏诸寺，因改招提以为白马。故诸寺立名多取则焉。”<sup>①</sup>从引文看，开始安置印度或西域沙门的“精舍（“寺”的异名）住处”后来才成为白马寺，而且白马寺的名称与求法（所谓“白马负经”）没有直接关系。因此，白马寺的名称是后来才有的。无论如何，白马寺是我国汉地最早的佛寺。

白马寺被后世佛门弟子尊为“祖庭（祖师之庭院）和“释源”（佛教的发源地）。寺内现存的不少碑刻和法器上都还留有“祖庭”“释源”字样。汉明帝“永平求法”是我国佛教史上第一次“西天取经”。因此，白马寺的建立是我国佛教史上的一大盛事。

白马寺建立后，第一部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即由摄摩腾、竺法兰在此翻译完成。中天竺律学沙门昙柯迦罗在此译出第一部汉文佛律——《僧祇戒心》。昙柯迦罗被后世佛教徒尊为中国律宗之祖。后来，又有僧人相继在此译经。随着佛经翻译的兴起，佛教的传播日益广泛。白马寺作为我国早期佛教活动的中心永远被载入史册。

## （二）楚王英奉佛

东汉明帝的异母弟楚王刘英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最早信仰佛教的人。《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楚王刘英年青时好游侠，结交宾客，建武十五年（39年）封楚王，二十八年（52年）赴楚国就任。晚年“更喜黄老，学浮屠，斋戒祭祀”。<sup>②</sup>楚王英曾被人诬告意图谋反，汉明帝于永平八年（65年）诏命天下，若献缣绢，则可赎死罪。

（大正藏》卷 50 第 322 页下、323 页上。

② 商务印书馆《缩印百衲本》第 628 页上。